

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 性质与挑战*

——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视角

李志永

【内容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较大调整，“奋发有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是理解各国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的综合理论，也是理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能力的快速强化和合法性的联动提升则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与一般理论集中关注外交行为本身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还注重阐释外交行为的性质。新时代的“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进取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当然，“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以韬光养晦为基础的奋发有为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奋发有为 韬光养晦 自主性外交 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 李志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29）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2-0070-21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2005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研究”（17BKS04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受惠于与熊李力教授、董青岭教授富有启发的讨论，在此深表感谢。

导 论

“韬光养晦”曾经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核心战略，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正在经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纵观五年多来的外交理论与创新实践，“奋发有为”已成为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突出特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①这是习近平首次用“奋发有为”对外交工作提出战略要求，这也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战略性调整。2014年7月14日，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前夕，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随着不断发展，中国将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②近几年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不仅在周边外交方面奋发有为，而且在大国关系、多边外交、全球治理等各个层面都奋发有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推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追求，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倡导，对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奋力争取，对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积极实践，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对地区热点问题的积极参与，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塑造，这些重大外交行动表明，中国已经并将在各种重大的地区性、全球性问题上奋发有为，以争取为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② 《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新华网，2014年7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7/14/c_126752042.htm。

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五年多来，在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积极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话语塑造力和形象感召力不断提升。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正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① 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外交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自觉的国际责任、更进取的外交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要求。一方面是作出新贡献，另一方面是呈现新作为。”^② 可见，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今后五年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奋发有为”的基调，近五年来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态势还将在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不断延续。

结合中国外交近年来的积极、主动态势，阎学通教授认为，相对于“韬光养晦”外交，“奋发有为”外交更加侧重争取政治支持而非经济利益，因而是一种更具外交担当的外交形态。^③ 尽管“奋发有为”外交具有诸多不同于“韬光养晦”外交的新特征，但本文强调的是其外交形态变得更加主动这一特征，这既是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表述，也是一种减少误解的界定，更是对当前中国外交现实的准确概括。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韬光养晦”外交，“奋发有为”外交是指，在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各种地区热点问题时，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交塑造而非被动适应的外交形态。可见，“韬光养晦”外交侧重于国内经济发展，而“奋发有为”外交则侧重于国际责任担当；“韬光养晦”外交侧重于融入世界，而“奋发有为”外交则更注重塑造世界。中国外交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② 《王毅谈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贡献、新作为》，外交部网站，2017年10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xhd/t1503118.shtml>。

^③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第1-35页。

积极塑造世界，并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此，本文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中国外交战略与外交形态这一重大变化，试图对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根源、性质与挑战进行理论分析，从而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一、既有解释的不足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解释逻辑

作为快速崛起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兴大国，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然而分析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描述性研究多于学术性研究。与此同时，尽管此轮中国外交转型恰逢国际关系理论界探索外交综合理论的初期，但相关理论创新尚不能充分阐释中国外交转型。而“奋发有为”外交出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新时代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评估其外交性质及其战略合理性，就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如何解释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就国内外研究来看，尽管有关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理念、新变化、新特点的研究很多，但多数属于描述型、总结型研究，^① 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掀起了有关中国“强势外交”^② 的激烈讨论。但总体而言，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少

^① 例如，截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在中国知网分别以“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习近平外交”为篇名，我们可以分别检索到 51 条、40 条相关成果，但这些成果基本都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或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创新、特点、价值、意义等的描述与总结，而对此进行理论解释的学术成果极少。

^② 本文中的“强势外交”是中性意义上的。相关研究参见：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54-67;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 Vol. 9, No. 2, 2013, pp. 111-131; Robert S. Ros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 Diplomacy’ 2009-10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Rosemary Foot, *China Across the Divide: The Domestic and Global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eptember 2013; Camilla T.N. Sørense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ao Guang Yang Hui’ to ‘Fen Fa You Wei’,”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1, 2015, pp. 53-73; Nien-chung Chang-Liao,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Vol. 12, No. 2, 2016, pp. 82-91.

对此进行理论层面的解释，导致诸多研究仅仅是“深刻的新闻”或“全面的描述”，而较少能够推动理论的进步。因此，对“奋发有为”外交进行理论思考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关于“奋发有为”外交的研究存在“实力论”“民族主义论”“领导人个性论”和“外交道义论”四种研究视角。

综观学界对所谓中国“强势外交”的讨论，“实力论”是西方诸多现实主义学者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势外交”源于其对自己实力增长的自信以及对美国衰落的乐观估计。^①而另一些学者虽然认同“实力论”，但认为中国的实力增长导致利益的扩展是必然的，因此中国外交走向积极是自然的，国际社会要关注的是如何更加准确地认知中国所发出的信息，而中国则是要考虑如何在有利形势下去“谋势”。^②“民族主义论”将中国外交走向强势的根源主要归于中国因实力增强和内部政治不安全感带来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强化。^③鉴于领导层的更替，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主要归因于领导人个性特点与信念也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观点，^④但“领导人个性论”显然忽视了中国外交变迁的深层原因。阎学通从能否为崛起国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角度比较了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认为强调政治支持的“奋发有为”战略比注重经济利益的“韬光养晦”战略更能促进中国的崛起。当然，由于道义现实主义将民族复兴界定

^①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 381-396; and Robert S. Ros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 Diplomacy’ 2009-10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② Kai He and Huiyun Feng,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9, No. 5, 2012, pp. 633-644; Feng Zhang, “Rethink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Beijing’s Evolv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Ideas in the Reform Er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9, No. 3, 2012, pp. 318-345; 潘忠歧：《从“顺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4-18页。

^③ See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54-67; Robert S. Ros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 Diplomacy’ 2009-10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Camilla T.N. Srense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ao Guang Yang Hui’ to ‘Fen Fa You Wei’,” pp. 53-73.

^④ Kai He and Huiyun Feng, “Xi Jinping’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3, 2013, pp. 209-23; 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1-20页。

为“在综合国力和国防影响力上赶超美国”^①，且过于强调扩大盟友的必要性，^②而忽视了一国崛起的内部基础的重要性。同时，道义现实主义似乎天然地认为“奋发有为”外交必然比“韬光养晦”外交好，却忽视了导致奋发有为的不同根源。因此，尽管“外交道义论”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奋发有为”外交的合理性，却制约了我们去探究其根源、性质的可能性，进而无法真正对“奋发有为”外交进行全面、准确的认识和评估。综上所述，既有国内外研究对“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挖掘不够，对其性质认识不足，进而对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认识不深。近年来，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试图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以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学派的雏形及其不足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更是内政与外交联动的时代，内外联动正在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常态。^③内外联动的时代让单纯结构取向或施动者取向的理论均难以解释现实的外交行为，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糅合。有鉴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综合单元与体系层次的外交理论研究日渐兴起，尤以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将体系层次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单元层次因素作为干扰变量，试图实现跨层次的理论综合，以解释更多的外交行为，但各种新古典现实主义或对国际结构这一变量不加讨论或仅将其当成背景性因素，这使得实际偏重国内因素解释的新古典现实主义难以成为一种跨层次的整合理论。因而，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多地提供了一种解释问题的思路，而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④在西方试图以外交政策理论

^①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第13页。

^②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第8页。

^③ 参见李志永：《内外联动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57-59页；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④ 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27-137页。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26页。

完善国际体系理论的同时，中国也给予了外交政策理论以应有的重视。宋伟甚至指出，“如何基于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有较强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是近十多年来国际关系学者们所面对的核心理论问题。”^① 在中国学界，创建与三大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相媲美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一直是部分学者学术努力的方向。近年来，诸如过程建构主义（或称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②、道义现实主义^③、国际政治的进化理论^④、复合建构主义（即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⑤、霸权利益理论^⑥、现实制度主义^⑦、“天下主义”^⑧、“华夏主义”^⑨、国际共生论^⑩等理论形式业已出现，尽管这些理论意义重大，但由于其未能整合国内层次变量，从而在本质上均属于结构或进程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

本文认为，一个完善的外交政策理论不仅应该包括结构层次因素，而且

^① 宋伟：《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 参见秦亚青：《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探索——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0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5页。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8000 B.C. to the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第5-31页。

^⑤ 参见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⑥ 参见宋伟：《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

^⑦ 参见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⑧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第2-33页。

^⑨ 参见叶自成：《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叶自成、龙泉霖：《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⑩ 参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35-42页；金应忠：《为什么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第1-17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3-18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1-17页；任晓等：《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应该整合国家层次因素。为此，既有的诸多中国学派雏形及其成果尽管能够部分解释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但并不能提供更为直接和全面的解释，因为其本质上不属于外交政策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诸多中国学派雏形中，阎学通倡导的个人层次的道义现实主义是可以直接解释一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成果。该理论从政治领导的个人层次对权力转移现象进行了分析，突出了政治道义对崛起国的关键作用，但是由于将施动者直接等同于政治领导进而等同于决策者本身，^①从而使该理论与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理论一样，均未能对国家进行本体论探究^②（ontological investigations）。事实上，将国家建构为施动者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步。^③真正的外交政策理论既不能单纯停留在结构层次，也不能单纯从施动者或个人层次出发，只有在对国家进行本体论探究之后，有机结合施动者与结构层次的综合理论，方能有效解释重大外交行为。与之相反，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赋予国家本体论地位，^④而且试图综合结构与施动者因素，^⑤有望成为一个能够有效解释各国重大外交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

（三）自主性外交理论解释外交行为的核心逻辑

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内外联动时代各国的自主性是以复合自主性（complex autonomy）形式存在的，即国家相对于国内外社会而拥有的自主决策、自主行动能力，此乃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外交目标。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外交行为取决于国家与不同结构性因素互联互动的性质、过程与结果，自主性的分布决定了各国的外交行为。由于国家自主性是国家实力、国家能力与合法性的函数，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各国重大外交行为是国

^①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第238页。

^② “本体论探究”借用了怀特的用语，参见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7. 阿什利将这称为“国家行为者”模式，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86. [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④ 参见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五章。

^⑤ 参见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三章。

家实力、国家能力与合法性内外联动的综合结果。具体解释逻辑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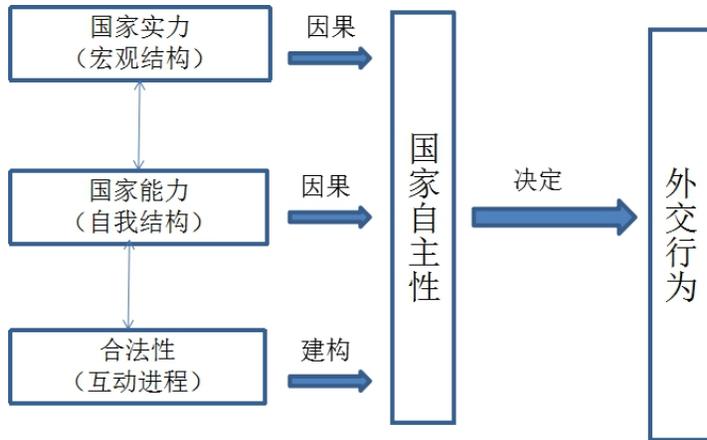


图 1 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解释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可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① 自主性外交理论源于对中国外交的长期思考，^② 同时整合了宏观结构层次的国家实力概念、施动者自我结构层次（即国家层次）的国家能力概念以及跨国互动进程层次的合法性概念，并通过国家自主性这一核心概念实现了理论整合，因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因果解释链条和较强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各国的外交行为。^③ 另外，由于国家自主性同时具有自主性能力与自主性地位的双重内涵，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能通过自主性能力分析外交政策的根源，还能根据自主性类型的不同与自主性地位的变化来辨析外交政策的进步

^① 王俊生：《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自主性外交理论〉评介》，《区域与全球发展》2017 年第 1 期，第 147-153 页。

^② 李志永：《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2 期，第 67-82 页。

^③ 关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内涵与假设，参见李志永：《内外联动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8 期，第 56-79 页；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六、七、八、九章。

性。^① 基于此，本文将尝试从自主性外交理论视角对新时代“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进行探析，并尝试评估其外交性质及其战略合理性，从而为深化“奋发有为”外交提供政策建议。

二、“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

国内外关于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以及“韬光养晦”战略的持续争论，需要我们回答“奋发有为”外交战略是否合理这个问题。经典现实主义的“实力论”强调权力决定国家行为，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在实力相对最强的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为何中国仍然坚守“韬光养晦”战略，更无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合理解释，反而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论据。西方传统的“民族主义论”一贯强调中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及其民族主义后果，但这一观点难以解释为何在中国国内政治并未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却经历了重大变化。“领导人个性论”显然过度强调个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却忽视了外交政策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外交道义论”从个人或政治领导层面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权力交接带来的国家行为变化，但把“奋发有为”外交完全归因于政治领导显然夸大了个人施动者的能动性，而忽视了其限度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自主性外交理论将“奋发有为”外交解释为中国国家自主性增强的结果，但由于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素是复杂的，因而该理论对“奋发有为”外交的解释不是单因的而是多因的。具体而言，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解释逻辑主要强调三点：其一，突出内外统筹的“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符合 21 世纪的时代特征；其二，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其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内采取的反腐、全面改革等举措，对国际社会的中国贡献，以及习近平主席的个人政治领导力，则是增强中国国家能力与国内、国际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这是“奋发有为”外交战略出现的直接原因。

^① 关于国家自主性能力的不同来源及其自主性地位与外交的进步性的关系，参见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八章。李志永：《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外交评论》2014 年第 6 期，第 40-58 页。

由此可见,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新时代“奋发有为”外交的合理根源,而且还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路径,即通过国内改革提升国家自主性。

(一) “奋发有为”外交符合内外联动的时代特征

“时代问题是外交决策者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①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但在此背景下,世界的基本特征正在发生深远的历史性变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源于在全球化与民主化双重变奏下,国际社会正进入内政、外交持续互动的新时代。“在内外联动时代,国家层面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然同时受到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影响与塑造,国家必须在常态性的内外联动背景下按照同一运行逻辑去理解和制定外交政策。”^②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外交工作的生命。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③在201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也已变得空前紧密。他继而指出,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④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实施是基于对内外联动时代的准确判断和深刻认识,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具有合理性。

(二) 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

根据图1可知,外交行为能力与国家实力具有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外交行为能力也将增强,国家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

^① 李志永:《内外联动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探索》,第57页。

^② 李志永:《内外联动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探索》,第59页。

^③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④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行动；反之，国家倾向于采取更加消极或保守的外交行动。根据表 1 可知，中国的 GDP 在 2010 年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而且在此前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基本上逐年增加。在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且持续低迷的情况下，2013 年以来中国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继续保持了中高速增长，领先于世界主要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中国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决定了“奋发有为”外交将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 2010—2013 年期间，尽管国内有学者呼吁中国要有所作为，放弃不结盟，积极探索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① 但中国外交却仍然延续了“韬光养晦”的外交主轴。由此可见，单纯的现实主义的国家实力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奋发有为”外交为何在 2013 年之后出现，这还需要考量国内因素。

表 1 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的变化（2008—2016 年）（单位：万亿美元）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中国 GDP	4.60	5.11	6.10	7.57	8.56	9.60	10.48	11.06	11.19
世界 GDP	63.39	60.09	65.91	73.24	74.80	76.96	78.87	74.51	75.54
占世界的比重	7.25	8.5	9.26	10.34	11.44	12.49	13.29	14.85	14.82
世界排名	3	3	2	2	2	2	2	2	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三）国家能力的快速提升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

从图 1 可知，外交行为能力与国家能力具有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外交能力也将增强，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积极的外交行为；反之，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消极或保守的外交行为。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阎学通：《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领导文萃》2011 年第 21 期，第 31 页；赵华胜：《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后对中国政策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23-29 页；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Layne)认为,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关键就在于国家能力,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将经济财富转化为硬实力。^①法里德·扎卡利亚也以国家能力而非国家实力来解释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交政策的转变。^②在一定意义上,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有效获取国内社会资源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深入的反腐行动,全面改革的启动,“四个自信”与“四个意识”的强化,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威信的确立均表明,中国国家能力在最近五年得到了快速提升。在中国的体系性权力地位未发生根本变化的五年中,快速增强的国家能力直接催生了奋发有为的积极外交行为。这正是近几年国内外讨论“强势中国外交”的真正根源。

(四) 合法性的联动提升是“奋发有为”外交的道义基础

从图1可以看出,外交行为能力与合法性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合法性的增强,外交行为能力也将增强,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积极或主动的外交行为;反之,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消极或保守的外交行为。阎学通曾经指出,“对第二大国来说,要制衡头号强国,增加战略盟友比获取经济利益更加重要。”^③事实上,从自主性外交理论看,增加战略盟友本质上就是提升本国外交合法性的重要路径之一。但与道义现实主义单纯从体系层次增加战略盟友的角度构思大国崛起战略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不仅可以从体系层次还可以从国内以及内外联动层次提升合法性。首先,从体系层次而言,一国提升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路径,包括增加战略盟友、遵守国际制度及其规则、外交行为与观念的社会化与制度化等路径。其次,从国内层次而言,一国提升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路径包括国内正向改革的诸多方面。再次,从内外联动层次而言,一国提升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路径是不断调整、整合国内外不同行为体的利益与目标关系,以增加其一致性、共鸣性,这要求中国外交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

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崛起国的成功和平崛起必须依赖于道义与

^① 冯黛梅:《美国大战略:竭力维持衰落中的全球霸权——访美国战略家克里斯托弗·莱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24日,A4版。

^②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第8页。

合法性的不断提升，但这种合法性不仅来源于体系层面，还来源于国内层面以及内外联动层面，是一种内外联动式提升。据此，从道义或合法性层面分析，中国实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从国际体系层次而言，遍布全球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而非革命者的声誉，中国对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倡导，日益增加的对外援助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日益活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等，均提升了中国外交行为的感召力与合法性。其次，从国内层次而言，对中国梦的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深入的反腐行动，普通民众对全面改革的期待，等等，均夯实了中国外交行为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最后，从内外联动层次而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两种资源的努力，中国内政、外交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均增加了内外行为的一致性，提升了外交行为的合法性。基于近五年来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联动提升，中国在国际上持续提出了许多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为“奋发有为”外交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但 2013 年之后“奋发有为”战略才真正取代“韬光养晦”战略，直接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内外政策迅速强化了国家能力，并提升了外交行为的合法性。

三、“奋发有为”外交的性质

对中国当前“奋发有为”外交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外交趋势的判断及其根源的追溯上，还必须关注、剖析其性质，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性质，才能真正对当前的外交作出分析并提出建议。因为只有进步的外交才能持续向前。尽管“进步”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人们难以在外交的进步性方面达成共识。但是，从根本上讲，外交的进步性或进步外交是指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外交观念与行为。^① 与一般理论回避外交性质不

^① 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 181 页。

同，自主性外交理论对外交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依据自主性外交理论，既然国家自主性决定外交行为，那么外交行为的进步性就可以从国家自主性的类型及其自主地位方面进行分析。因此，国家自主性的类型变化与自主性地位提升就构成了自主性外交理论衡量外交进步的两个重要维度（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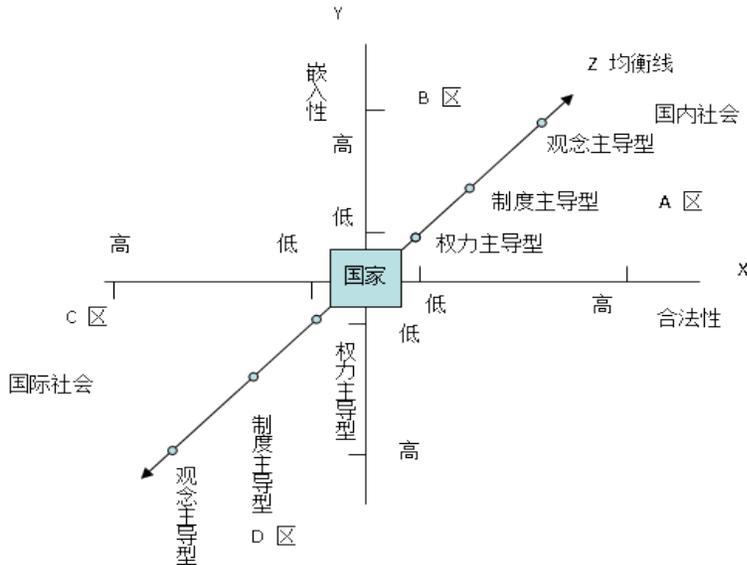


图 2 进步外交理论

资料来源：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2 页。

（一）国家自主性的分类及其演进

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国家自主性一般的演进逻辑是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再到观念主导型，这不仅体现了国家自主地位的提升，而且将推动国家外交的进步。^① 因此，对国家自主性类型的辨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分析外交行为，并作出有利于外交进步的总体判断。^② 从纵向上看，依据国家

^① 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 187 页；李志永：《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第 48 页。

^② 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 187-188 页；李志永：《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第 48 页。

自主性的类型，中国外交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权力主导型的政治外交阶段（1949—1978年）、制度主导型的发展外交阶段（1979—2009年）和观念主导型的大国外交阶段（2010年以后）。^①正是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历史演进推动了当前“奋发有为”外交的进步。从横向上看，目前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是以制度主导型为主，同时兼有观念主导型的特点。在国内层面，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构建良性的制度互动环境；在国际层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制度性合作（如中国保持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开放性）而非单纯的制度性竞争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关切，这保障了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和平性质。同时，观念主导型国家自主性在中国国家自主性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国对国际话语权、新型义利观、中国方案、命运共同体、新型双边关系的反复强调和重视均体现了这一点。

（二）国家自主性地位的提升

就国家自主性的内涵而言，外交是否符合社会公众利益不仅取决于自主性的演进，还取决于国家是否具有真正的自主地位。国家的自主地位既需要合法性的认可，也需要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支撑。根据自主性外交理论，外交的进步性取决于国家外交观念与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及其程度高低，并以外交观念的社会化程度加以衡量。^②党的十八大以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大国责任等，这些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外交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相较于此前的试图“另起炉灶”式的革命外交和更多关注本国利益的发展外交，当前更开放、更强调责任的中国外交的社会化程度已大为提高。另外，根据自主性外交理论，外交的进步性还取决于国家相对于国内外社会是否具有“嵌入性”及其程度高低。^③所谓“嵌入性”就是指国家与国内外社会的制度化联系，即国家与国内外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程度。制度化程度越高，“嵌入性”越高，外交进步的可能性

^① 关于中国外交的阶段划分及其依据，参见李志永、袁正清：《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论》，《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第21-22页。

^② 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190页。

^③ 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190页；李志永：《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第49页；

就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在国内加强了各种制度化建设，还进一步明确了现存国际体系受益者的身份，并继续坚持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政策。当然，与“韬光养晦”外交时期侧重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不同，“奋发有为”外交强调在继续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积极推行自主性战略，即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这种自主性战略表现为，当前中国对现有国际制度不仅进行了规则重塑，还在国际制度边缘或空白地带建立了有利于国际秩序公正化的新机制。从上述实践来看，只要中国外交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中国对国际制度建设的“协商介入”将推动中国外交达到更高的制度化水平，即从参与型制度化到塑造型制度化的转型升级。为此，一方面，中国外交必须继续实施融入战略，加入更多主流且合理的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在追求自主性战略目标的同时，保持“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框架的公平性、开放性、透明性，真正把中国推动建立的合作框架打造成区域甚至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提升中国外交的制度化水平。

四、积极应对“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挑战

“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奋发有为”外交的发展将一帆风顺。相反，“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面临诸多挑战。自主性外交理论强调国家自主性的社会基础，即国家需要获得国内外社会的支持。^① 以此观之，“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层面需要处理好“民族主义”的上扬，普通民众对反腐败的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等问题；在国际层面则要处理好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经济影响，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贡献的期待等问题。如果说处理好这些问题能够增强“奋发有为”外交的社会基础，那么处理不好则可能构成挑战。另外，中国外交的发展基于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内在发展，能否通过内部改革推进国家自主性的不断发

^① 李志永：《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第 211 页。

展是“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另一挑战。可见，“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既有外交战略的基础、外交进步性能否持续维持和改进，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与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

（一）国内社会的挑战与应对

面对内政与外交互联互通日益强化的现实，“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挑战首先源于国内，并受到国际压力的刺激而变得日益紧迫。就此而言，来自国内社会的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全面改革能否持续推进，从而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进而保障“奋发有为”外交的持续推进。其二，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民族主义在推动“奋发有为”外交的同时，存在走向极化的可能，并将制约外交让步、外交协调的空间，进而对中国处理东海、南海、中印边界问题等领海、领土问题产生潜在的影响。其三，反腐败不仅净化了国内政治空气，而且奠定了“奋发有为”外交的社会基础，但反腐败如果难以从机制层面更深入推进，将削弱“奋发有为”外交的社会基础，进而制约政府的动员能力。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交错，容易导致民粹主义和激进思想的蔓延，进而成为“奋发有为”外交的观念瓶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必须始终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冲破各种藩篱，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做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为此，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改革，保持强劲的改革势头，以改革化解前进中的各种矛盾；二要积极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适时、适度地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合理引导，为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理性的舆论环境；三要切实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政府的各项权力在法律轨道上运行，保持并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四要广泛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为“奋发有为”外交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二）国际社会的挑战与应对

如果说中国外交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在于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国际挑战则更难以控制。其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结构性防范以及由此引起的部分周

边国家的追随、观望将增加中国崛起的现实压力。其二，中国在制度层面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已经引起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警惕与防范。其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困境，或将降低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吸引力。其四，西方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将加剧“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其五，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领海、领土争端的激化，周边热点问题的久拖不决，可能打乱“一带一路”倡议的既定进程，促使中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转移到主权维护而非国际制度的塑造上。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外交必须始终做好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为此，一要切实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以和平发展为目标，以合作共赢为路径，真正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二要始终坚持国际体系改革者的立场，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动现有国际制度的优化，推动国际制度的公正、民主，同时保持新的国际制度的开放性、透明性；三要在展现自信的同时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要在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中国模式，提供更好的中国方案，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感召力；四要始终倡导互利共赢的原则，保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以包容互惠的理念为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打造更为宽广的平台；五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切实管控好各种国际冲突风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

（三）国际话语权的挑战及其应对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关键塑造者和重要领导者，但尚未形成与这种角色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有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后来者的历史原因，也有中国为世界提供的观念性公共产品不充分的现实原因。具体而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公共外交的挑战，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公共外交的效果，让爱好和平、奋发有为的中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伴随大众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参与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推行，公共外交已经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有关公共外交的本质内涵、实现形式、传播路径、传播技巧受到了广泛关注

和深入研究，中国公共外交经验欠缺的技术性短板基本得到弥补。因此，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主要不在于传播经验的欠缺而更在于传播内容的不足。其二，观念创新的挑战，即如何真正提升中国观念、中国规范的共享性，进而主动引领、塑造国际舆论，实现从中国话语到世界话语的无缝对接，实现理念创新的目标。但观念具有的共享和私有两种属性使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推广中国方案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义为利的正确义利观，等等，这些中国理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交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另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又往往使中国的诸多倡议遭到质疑，加剧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利于中国外交的推进。

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中国必须做好长期规划。其一，中国要在总结公共外交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公共外交本质的研究，使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进同步推进，最终提升公共外交的效果，真正让国际社会理解、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道路。其二，中国外交要真正做好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在融入中提升中国外交的制度化水平，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其三，中国外交在理念上要做好特色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平衡，进而打造一套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以占领价值竞争新高地。

结束语

纵观近五年的中国改革与外交，尽管全面改革已经启动，制度反腐正在推进，但国家自主性在经历阶段性提升后将受到经济下行的制约。与此同时，中美结构性竞争日益激烈，在中国经历国内改革困境之时，美国的实力、威望或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与观念性制约或将日益加大。因此，“奋发有为”外交或将遭遇日益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同时，“奋发有为”外交主要根源于国内自主性的强化，并主要表现为国家能力的提升。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积极重塑国际规则的背景下，开展进取性外交，不仅可能

存在战略透支^①的风险，而且可能面临“中国威胁论”影响持续扩大的舆论风险，进而造成“奋发有为”外交遭遇更大制约与挫折的可能。为了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必须对日益增强的国力进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就此而言，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学界、政界学习和总结。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超过英国，位列世界第一，但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才真正放弃孤立主义外交传统成为世界霸主。除此之外，就中国崛起目前面临的现实态势而言，中国内部还面临诸多脆弱性，对这些问题也应该警醒。就中国崛起的未来态势而言，中国崛起必然要在国际制度与观念结构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争取更大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真正全方位地提升国家自主性能力。中国国家自主性在机制与观念层面的缺失与不足，决定了在中国真正崛起前，作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的“韬光养晦”外交不能被放弃。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综上所述，尽管“奋发有为”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之路，但必须明确，“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以韬光养晦为基础和前提的奋发有为应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收稿日期：2017-05-23]

[修回日期：2017-12-05]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参见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57-68 页。